



周琼◎主编

道法自然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
视角和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琼◎主编

道法自然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
视角和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法自然：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视角和路径 / 周琼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940 - 9

I. ①道… II. ①周… III. ①环境—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X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967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675 千字
定价 1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4年8月21日，“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召开，来自德国、美国及中国台湾、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的变迁及相关理论问题，在研究历史环境变迁的基础上，探索解决环境问题、治理环境危机的历史经验及措施。

生态危机及环境问题是目前政府和公众普遍关注、众多学科和学者高度聚焦的全球性课题之一，社会各界对保护环境、共建和谐生态已达成共识，但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依然比比皆是，中国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仍呈现继续恶化的态势。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气候异常等事件，不仅严重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及健康安全，也威胁着国家及区域的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全球的安危及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国西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也是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虽然比国内其他一些地区要好，但生态危机也酝酿已久，各种环境问题、环境灾害时有发生，西南地区的环境变迁既受临近区域的影响，也对临近区域造成影响。由此可知，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是全中国、全球生态链及环境变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探究区域生态环境的变迁和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鉴现实，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功能，是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责任及使命，环境史因之成为极具学术价值及现实使命的史学分支学科。当前，因气候异常、历史环境变迁及人为影响加剧，世界各地环境危机、生态灾害频发，尤其在2009—2013年西南地区持续性特大旱灾、2014年8月3日云南昭通鲁甸6.5级地震灾害，广东、广西、贵州、重庆等地奇旱奇涝等环境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召开“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国际学

术研讨会，对深化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环境史、边疆史乃至中国环境史、世界环境史的研究，提高生态恢复及环境治理的能力，强化西南乃至中国生态恢复及重建的能力和技术手段，促进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史作为最受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环境史在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区域尤其边疆民族区域环境史的研究较为薄弱。中国西南地理位置、地质面貌、气候等自然条件特殊，生态环境多样性特点突出，既有环境变迁史的共性，也有区域生态史的特点。各民族在与自然界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养成了一些独特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及传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及丰富的生态文化，是环境史研究及生态人类学、环境口述史等领域值得深入探究的区域。会议围绕“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的主题，结合环境史、疾病史、灾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借鉴生态学、气候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及其成果，展开多视角、跨学科的高水平研讨，探讨西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边疆民族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总结西南各民族利用及保护环境的经验教训。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提交的论文及讨论，极大地拓展了西南边疆环境史研究的视域及研究方法，推进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深化各区域、各民族环境文化的交流及发展，促进了西南及中国、全球生态环境和谐、健康、永续的发展。

这次会议，对云南大学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云南大学是我国西部边疆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民族学、生态学为特色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人才密集，学术平台完备。近年来，云南大学遵循“立足边疆、服务云南、提升水平、办出特色”的办学思路，紧紧抓住“211工程”建设和省部共建的机遇，视学术创新为学校发展之动力，大力发扬注重学术的办学传统，推行学术兴校和科研平台建设，使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上了新的台阶。云南大学积极扶持特色学科的建设及发展，2009年5月支持成立西南环境史研究所，积极推动西南灾荒、西南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开拓云南大学学科建设的新领域，在学术研究及人才培养工作中一直勤奋耕耘，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得到了前辈及同

行专家朋友们的认可，但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莅临会议的各位专家对云南大学环境史学科的建设献计献策，关注和帮助西南环境史研究，深化了区域史、边疆史的研究，也促进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提升了环境史研究的视域及水平。

与会学者多为环境史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研究声誉和水准的知名学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已经在环境史研究领域深耕数十载，对环境史的理论与方法有着深刻见解，学者们畅所欲言、增进交流、共同提高，可喜的是，很多学者曾就某些具体问题展开过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很多著名学者已关注并进行了云南环境史的研究，会议的相关研讨不仅影响了西南环境史研究者的思路，拓展了西南环境史研究的视域，进一步推进了云南大学环境史研究的水准。毋庸置疑，会议的研讨及相关思考，将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及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

目 录

◎理论·方法◎

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轨迹

——浅谈中国环境史的“问题”和“主义”…………… 王利华(3)

清中期东川矿业及森林消耗的地理模型分析

(1700—1850)…………… [德]Nanny Kim(金兰中)(15)

环境史视域中的生态边疆研究

——以物种引进及入侵为中心…………… 周 琼(44)

全球化视野下的全球环境变化成因及对策分析…………… 丁 扬 李益敏(71)

文献计量学视野下大陆地区环境史研究综述(2000—2013)

——基于 CSSCI 的统计和分析…………… 薛 辉(80)

近代来华西方人记述中国环境变化文本的传播及影响…………… 刘 亮(106)

中国环境史研究心态刍论

——基于初学者的视角…………… 李明奎(120)

◎城市·乡村◎

从环境史看近代云南的城市化…………… 刘翠溶(137)

明清时期玉米在云贵传播的空间差异…………… 韩昭庆(166)

地方文献与明清环境史研究

——以嘉陵江流域为主的考察…………… 马 强 杨 霄(175)

- 耕地的消失:城市化、产业化与湖泊保护的博弈
——滇池西岸观音山白族村土地利用变迁研究 吴 璘(189)
- 排瑶传统乡村聚落的景观特点及形成机制
——以广东连南地区油岭、南岗为例 周 晴(201)
- 近代云南矿业城市的形成及其影响 赵小平(215)
- 官民反应与区域生境:民国时期昆明地区的森林
覆被研究 耿 金(229)

⊙ 疾病·医疗 ⊙

- 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
——立足于疾病与健康议题的思考 余新忠(249)
- 清末西南边疆商埠的气候环境、疾病与医疗卫生
——基于《海关医报》的分析 佳宏伟(262)
- The Origins of Yunnan Anti-Malaria Commission,
1935 - 1939 Yubin Shen(286)
- 民国以前湖南疫灾流行与环境的关系 杨鹏程 杨妮兰(300)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瘟疫流行与战时
环境关系 胡忆红 彭 丹(320)
- 民国时期云南麻风病人污名化的个案分析 刘少航(330)

⊙ 灾害·救济 ⊙

- The Energetics of Militarized Landscapes
——Wartime Flood and Famine in China's
Henan Province Micah S. Muscolino(341)
- 请神祈禳:明清以来清水江地区民众的日常灾害
防范及其实践 吴才茂 冯贤亮(364)
- 论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灾变的救治 罗康隆 刘 旭(393)
- 光绪年间的自然灾害与农业经济 张高臣(411)
- 20世纪前半期云南地震救灾资源条件分析 杨丽娥(430)

1925 年云南霜灾之因探析	濮玉慧(440)
----------------------	----------

◎ 区域·民族 ◎

黄金纬度的生态变迁	林超民 黄泓泰(459)
清代登陆海南岛台风对西南地区的影响	满志敏 刘大伟(473)
内亚的边缘及其景观变迁	
——以鄂尔多斯南缘为中心的讨论	张 萍(480)
水土资源结构与县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关联性分析	
——以新疆墨玉县为例	管彦波(501)
清代越南使臣视野中的广西区域景观形象	
——以越南使节广西纪咏诗文为考察中心	陈国保(521)
传统水利社会的困境与出路	
——再论民国沅江廖堡地区河道治理之争	刘志刚 陈先初(554)
西南少数民族林业谚语的生态思想解析	刘荣昆(578)
西北与西南	
——敦煌文书所见“瘴”字与云南瘴气对比研究	史志林(592)

◎ 环保·实践 ◎

略谈传统环境保护地方性知识及其教育	
——以纳西族为例	杨福泉(613)
民国时期水土保持学的引进与环境治理思想的发展	李荣华(628)
20 世纪 70 年代的环境污染调查与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刘宏焘(641)
论当代中国西部地区环境问题的两大社会特征	徐 波 李 刚(658)

◎ 会议综述 ◎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环境变迁”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周 琼 李明奎(677)
--	--------------

后 记	(689)
-----------	-------

理论·方法

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轨迹*

——浅谈中国环境史的“问题”和“主义”

王利华

作为一门新兴史学，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无疑还是相当稚嫩的，还有不少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虽然时下史学更重实证研究，不尚玄虚之论，但理论方法探讨对于初生的环境史还是相当重要的，同仁应该勇敢地开展一些讨论。笔者不才，愿意陈述几点谬论，供大家批判。

一 环境史与史学思想的转向

环境史家认为：历史不是由人类单独创造的，众多自然因素参与其中。这种观念，促使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思想方法正在艰难地经历若干重要的转向。

一是尊重自然的历史价值，承认并且实证考察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

在环境史的视野中，自然环境既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也是人类历史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3&ZD080）。

作者简介：王利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环境史、中国古代史及农业史。

的参与者。因此，不能仅仅在思想上承认自然世界及其变化对人类历史具有影响，而是要在行动上把不断变化的自然事物、现象及其对人的影响纳入实证考察范围；在环境史的叙事中，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不再只是抽象、静态和理论上的，而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具体、活跃和能动的历史角色，是所谓“自然进入历史”。^①

二是重新定位人类的角色，考察其既受制于自然又改变自然的历史过程。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创造并运用文化适应和改变着自然界，在地球生态系统演化中担当渐趋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地球故事的主角。特别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和“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②然而，地球并非人类独占并且可由他随意改变的家园，历史也不是人类挥袖独舞的戏剧。人类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能力——创造并运用文化，因此自诩为万物之灵长，但终究亦只是地球上无数物种中的一员，不能脱离地球生物圈而生存，亦不能摆脱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在环境史叙事中，人类的角色甚至命运乃是通过他与自然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来判定。环境史学者回顾人类与自然交往的长期过程，特别是检讨农业时代以来人类活动的环境制约和环境影响，重新定位人类自身，是为“人类回归自然”。

三是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生态关系。

在环境史视野中，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是相互因应、协同演变的“此方”与“彼方”。环境史家首先承认人类是大自然中的一员，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但人类又是一个具有文化自决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特殊物种，拥有按照自己的精神意志改变自然环境的强烈冲动和高超能

① “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是李根蟠先生对环境史意义的概括。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二章《生物圈》，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力，因而人类历史进程并不完全由自然环境因素决定。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环境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生态关系，人与自然彼此因应、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常常互为因果，并非始终都是简单地由一方决定另外一方。这样一来，环境史研究者就应当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回到历史的实际情境之中，具体考察环境与社会究竟是如何彼此作用、相互反馈，深入揭示人与自然如何往复因应、协同演化。

二 环境史的“问题”与“主义”困扰

近年来，随着环境史研究逐渐展开，理论困扰越多。这些困扰，既关乎“问题”，也关乎“主义”，有的似乎应上升到历史哲学高度来做思维。若不能克服这些困扰，环境史恐怕不能成为一门成熟的学问。

“问题”的困扰主要关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近年来，环境史研究已呈如火如荼之势。然而，环境史应该重点探讨哪些“问题”，环境史所关注的“问题”与其他领域有何不同？对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中外学人已经做过不少讨论，但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在具体课题研究中，我们也许不必纠结，只要课题关涉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即可以被视为环境史。但一旦动手编纂一部中国环境史教材、一部断代环境史，甚至一部中国环境通史，困扰就发生了。作者需要反复思忖：这本书必须包括哪些基本内容才能得到学界首肯“这就是一部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史、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著作？从这个角度看，环境史需要研究哪些“问题”，既是一个学科框架问题，更直接的乃是一个历史编纂学问题。环境史研究者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和话语体系，甚至要进行历史观念与知识的系统重构。

“主义”的困扰则关乎环境史观和价值判断。环境史研究应当奉行什么“主义”，基于怎样的历史观念进行“价值判断”？这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困扰。我们知道：在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界）等领域，曾经多次发生“文化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激烈争论，思想分歧至今并未完全消弭。在环境研究领域（如环境伦理学），则发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严重思想对抗。这些都必然对环境史观产生一定影响。

众所周知，摈弃“人类中心主义”而奉行“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核心主张。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环境保护运动密不可分，自然不能不受其影响。我相信绝大多数环境史学者都同意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事物的存在价值，重视生态环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点，环境史学者试图重新认识许多历史现象、事件和人物，做出与以往相当不同的解说和评价。如果放弃这些方面的努力，环境史研究就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然而历史学家果真能够彻底地奉行“生态中心主义”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过去的历史观念是否可能被彻底颠覆？！这种忧惧并非毫无根据。观察当今围绕环境问题而发生的种种争论甚至政治对抗，我们常常感到不知所从。环境保护人士对大自然的那种宗教式情怀，对“原生态”的那种顶礼膜拜式赞美，非常让人感动。有时我们很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当今中国生态环境形势如此严峻，我们确实需要“洗心革面”。但有时又觉得对立一方的许多观点更切合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可取。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研究环境史，我们的思想难免陷入混乱。一直以来，我们坚信：追求物质生活富足是“天赋的人权”。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毋庸置疑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然而，这些年的环境史论著总是在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与环境破坏始终相伴而行，这是全人类的普遍历史经验。如此一来，历史就变得极其吊诡：人类不断追求物质财富、发展物质文明，其实是在不断毁坏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如何认识这一严重的吊诡现象？环境破坏是否就是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代价和结果？如果是，人类一直追求“进步”，其实恰恰就是“反动”。那么，为了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是否应当从现在开始就停止一切发展？如果不是，我们又应该如何评判历史上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所造成的环境改变？对于环境史研究来说，目前亟须形成一个正确的历史价值取向，以便评判以往的人类环境行为和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能形成理性的历史价值判断，提供正确的环境史观，环境史学者必将陷入历史悲观主义而不能自拔，成为“文明原罪论者”甚至“反文明论者”，而人类文明发展也将可能迷失方向。

拜读多年来的中国环境史论著，笔者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相

关研究中，采用经济史视角和采用文化史视角，所得出的结论似乎完全背道而驰：采用经济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满篇都是讲先前环境是如何、如何好，由于经济开发，后来不断恶化了：森林没有了，野生动物没有了，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社会经济也因此陷入了发展困境。这种“经济开发导致环境破坏，环境恶化导致经济衰落”的因果分析，看起来很清晰明了，但似乎完全否定了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合理性。采用文化史视角的环境史研究则不同，满篇都在讲述中国很早之前就有了这样、那样先进的环保制度和政策，古人很早就主张“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具有非常高明的生态思想智慧。有的甚至认为运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智慧就可以拯救今天的地球。但持此论者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史实：几千年来，中国自然环境由于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是地球上被破坏得较严重的土地之一。既然中国那么早就有了那样先进的思想智慧，为什么生态环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都怪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吗？我相信：这类困扰不只存在于环境史研究中，也存在于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生态人类学等相关领域。

三 生命关怀应当成为环境史学的精神内核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是两个相反的思想立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调和的可能性？能否找到一个“中道”？最近几年学术界一直在苦苦求索，仍无答案。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可取，没有人真的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止一切发展，除非他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等领域目前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这个思想的通俗表述是：没有保护的发展是“竭泽而渔”，没有发展的保护是“缘木求鱼”。中国“人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极其深厚，提出这种观念并不奇怪。再说，我们都是人，不可能大公无私到不“以人为本”。问题是：什么是“以人为本”？以什么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以人类对物质财富没有节制的欲望为本吗？

笔者曾试图将“以人为本”说得更明确一点，提出“生命中心论”

或“生命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主张以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本。^①我认为：对环境问题——不论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判断，都应基于一个核心：是否有利于人类种群延续、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笔者觉得环境史研究应当以人的生物属性作为思想起点，以人的生命活动作为叙事主线来规划课题和进行历史判断。这或许能跳出目前思想争论，回到历史实际和问题本质。

提出这个想法，既是基于人的生物性，也是基于生态学原理；既是基于中国环境问题现实，也是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具体想法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类兼具文化属性和生物属性。人类主要通过文化方式而非依靠本能来适应自然环境、发展经济生产、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物质需要，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属性。但文化属性并不能使人类完全免除其生物属性，不能摆脱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拥有文化的人类并不能放弃对食物、空气、水……的需求，不能完全摆脱病毒、细菌、有害物质和其他不利自然因素的伤害。从理论上说，一切文化创造和经济活动首先都是为了保障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种群延续，但历史实际并非如此。特别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过度张扬，由于资本利润私欲的极度膨胀，不少方面的人类活动强度逼近甚至超过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极限，违背自然生态规律，因而不断走向人类理想目标的反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匮乏了，食物有毒了，空气污染了，土地退化了，水体黑臭了……首先受到挑战的就是人的生物属性——作为一种生物，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自己的认识错误和行为不当日益受到威胁，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这迫使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物属性与历史地位，对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文明进行系统性历史反思。

其二，生命是生态学的问题和理论核心。许多学者主张：生态学是环境史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什么是生态学？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一百多年来生态学发展出了很多分支，但始终都是以“生命”为中心，对特

^① 笔者最早初步提出这一概念是在2010年，见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这里根据近年思考作进一步申论。